

漫人·漫事·漫笔(十三)

## 我珍藏的两幅 华君武先生的作品

●徐鹏飞

我母亲晚年得了糖尿病，后来发展成尿毒症，需要血液透析。2002年母亲每周需透析两次，她没有医保，全部费用由我承担。

一次漫画评选活动结束后，刚要离开，听到华君武先生叫我。他在会议室门口的椅子上坐着，看来已经等我多时，我赶紧走过去。华老从布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说：“听说你母亲得病，我也帮不上忙，这两幅画送你，拿去换点儿钱给你母亲治病用……”

我至今珍藏着这两幅画。



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纠正偏差或错误，首先要展现无比积极的态度，下狠心用猛劲，于是，又陷入另一种偏差或错误当中，即矫枉过正。

矫枉过正，典出班固《汉书·诸侯王表序》。说的是西汉初年，为革除秦朝过分集权的弊病，设王分封，大的诸侯王国跨州兼郡，拥有几十座城池，宫室百官同朝廷无异，“可谓矫枉过其正矣”。结果，异姓诸侯王慢慢坐大，纷纷叛乱；消灭了异姓王，保留同姓王，又爆出同姓不同心的问题。汉文帝时，济北、淮南两王谋反；汉景帝时，欲推行削藩政策，藩王借故发动“七王之乱”。西汉认为秦朝实行郡、县制，是其覆灭的根本原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秦朝推行郡、县制，恰恰是汲取了东周因分封制而崩溃的教训。

再说宋朝。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后周天下，建立北宋。“天子，兵马强壮者当为之”，乃五代

## 文人的洁癖

●迂夫子

“癖”字偏旁是“疒”，按照古人造字的逻辑判断，“癖”该是一种“病”，比如洁癖，就是指洁净成癖。文人也有洁癖，尤其旧时文人的洁癖故事颇多。

元朝倪瓒有洁癖：书房要干净整洁，每天两个童子洒扫擦抹不停；庭前有梧桐树，早晚打水揩洗，结果树竟然死了。这洁癖难免有些迂腐，也难怪他自号“倪迂”。然倪瓒迂得蛮可爱，一事为证。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听说倪瓒画得好，就派人持重金求画，倪瓒怒道：“我不做王门画师。”直接就把张士信的面子卷了。张士信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他。一日张士信游太湖，闻到一舟中有异香扑鼻，就跟同游的人说，这舟中一定有名流雅士。移船靠近一看竟然是倪瓒，张士信大怒，欲杀倪瓒，被同舟人劝住。最后张士信为了解气，还是狠狠抽了倪瓒几十鞭子。倪瓒挨了鞭子却一句话都不说。后来有人问倪瓒：“你受尽侮辱为何一言不发？”道：“一说便俗！”连和败类说话都觉得俗气，倪瓒的洁癖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汉朝人蒋诩，刚正耿直，也有洁癖。王莽篡权后，他便告老还乡隐居。他家庭院设三条小径，一条供自己走，另两条分别供好友求仲和羊仲

行走，史称“三径”。蒋诩的三径，其实是在向世人宣示他的“洁癖”：我这茅草屋，只有我的朋友才能来！言外之意，他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交往的，要看能不能对脾气，有没有共同语言。

东汉名士陈蕃得罪了权贵，被贬为豫章太守。豫章有一名士徐穉，字孺子，素有“南州高士”的美誉。陈蕃十分敬重徐穉，想请他到府衙做事。徐穉坚辞不就。出于对陈蕃礼贤下士的敬重，徐穉答应经常来拜访陈蕃。陈蕃就专门为徐穉做了一个床榻，平时挂在墙上，只有徐穉来访才把床榻放下来。这个典故被王勃引在《滕王阁序》里，谓之“徐孺下陈蕃之榻”。

倪瓒不愿结交权贵，蒋诩“三径”只为两位好友开，陈蕃之榻仅供徐穉一人使用，三人的“洁癖”，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爱干净成癖，实为人格上的洁癖。不但自己洁身自好，交往也只选择志同道合的人，视非同道之人如无物。

《增广贤文》有云：“损友敬而远，益友敬而亲。”交友上有些洁癖是对的，如果是非不分，好赖不辨，跟什么人都能称兄道弟，极容易“近墨者黑”而不自知。主动远墨近朱，就是一种洁癖——爱干净。

有句话曾经热传：“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今天，我这个《讽刺与幽默》的人来谈谈“讽刺与幽默”。

吴敬梓和鲁迅都已远去，时代不同了，对讽刺与幽默也有了不同认知和要求。

讽刺与幽默是一种素质，是个人的素质，也是一种民族素质。中国的讽刺幽默艺术由来已久，时代不同，特色也不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涉及物质与精神诸多方面，生活中的幽默、精神愉悦不可或缺。因此，繁荣兴盛社会主义文化，用幽默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让人们幽默起来、让人们笑起来，正是《讽刺与幽默》的使命与责任。

## 以「讽刺与幽默」 写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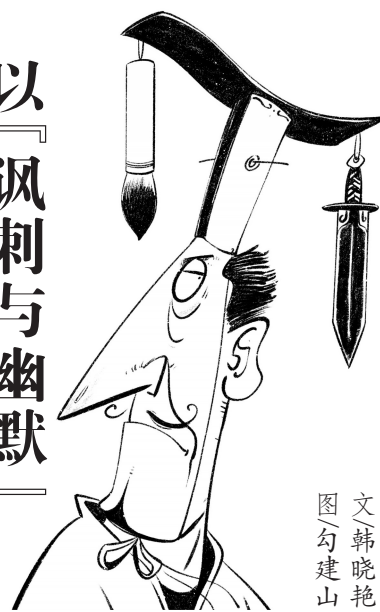


图 文韩晓艳  
勾建山

当下，人们对讽刺与幽默有一些错误理解。一提讽刺，有人就觉得是挖苦贬损，会得罪人，不敢下笔，怎么办呢？就像郭德纲在相声里说的，只能拿搭档于谦的父亲开涮了。但是，这样的“讽刺与幽默”，也就没有了价值。

事实上，“讽刺与幽默”是一种最好的“提意见、讲问题”的方式，也容易被他人接受。除了吴敬梓之外，中国史上还有不少“讽幽大师”，如楚之优孟、汉之东方朔、晋之阮籍、宋之苏轼、清之纪晓岚……甚至是博学的先秦诸子，也多有“讽幽细胞”，在游说列国时，也常常要拿一个有趣的故事做开头，故事里那些愚夫蠢人的荒唐行径，让闻者在大笑的同时，自然而然被说服。

作为“讽刺与幽默”专业人士，我认为进行“讽刺与幽默”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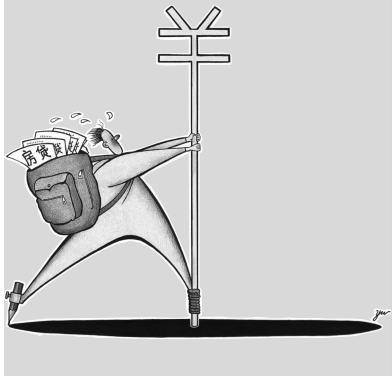
1. 发自善意，是为了别人好；
2. 立足点正确，从对方的角度出发；
3. 运用方式得当，掌握分寸。

《讽刺与幽默》是一份针砭时弊、让读者在讽刺与幽默的愉悦中受益的报纸，我们报纸很多作者的文章和漫画，出言巧，构思妙，常“讽”于不经意间，值得揣摩和学习。

如果说，《儒林外史》是用“讽谐寓真”的笔法写儒林，那么，《讽刺与幽默》则是用讽刺与幽默的漫笔书天下，以讽刺与幽默写春秋。

## 矫枉过正

文/张树民  
图/闫伟



时期的真实写照。鉴于此，赵匡胤极力崇文抑武，不仅杯酒释兵权，还采取文臣任武职，武将不带兵等“妙招”，让“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铲除武装割据的土壤。矫枉过正的后果，是军队战斗力极大削弱，始终被动挨打，边境不宁，最后不得不龟缩南方

一隅，直至灭亡。

矫枉过正之误，乃为“过正”。“过正”即“过度”“过分”之意。凡事皆“过犹不及，物极必反”，那么，这个“度”就很关键。怎样才能“适度”？怎样才算“过度”？

一拍脑门的“矫枉”，往往容易“过正”。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实践去摸索，“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反思，从而找到“矫枉”的“适度”点。“上面怎么说的，下面就怎么做。”面对刚性要求和问责压力，不管具体执行是否符合实际，有些人不再寻求灵活创新，一味“照章办事”。从表面看，似乎没错。细究之，一拍脑门的刚性要求，否定了灵活创新；反之，不从实际出发，“照章办事”，都有矫枉过正之嫌。

切勿以“过正”来实现“矫枉”，否则“矫枉”就可能走向反面；倘若以一种倾向代替另一种倾向，仅是从旧“枉”走向了新“枉”。